

禁錮與救贖

——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火燒島風情系列》探析*

侯如綺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火燒島系列風情》兩部作品同樣發表在九〇年代初期，兩位作者也同樣是由自身經驗（軍人／新生）出發，分別書寫在戒嚴時期兩個異質空間「特約茶室」和「綠島監獄」中的身體。

金門做為反共復國的堡壘、綠島成為監禁犯人的惡魔島，這兩個島嶼有著相對於台灣本島的符號性指涉。但是，創作主體面對無法主動加以扭轉的空間場域，也有其主觀感性和思想，他們的書寫在抗議扁平化的符號意義加諸他們的同時，深度展開了自身存在課題的思考。

本文進一步分析兩部作品裡以水為中心的意象群，闡釋作家對於自由、慾望、知識與生命的渴望。在水的原始物質意象的呼喚中，舒暢與梅濟民統一了來自水本身的原始特質以及他們不得不身處孤絕島嶼的無奈處境，改寫國家機器將空間符號化的詮釋方式。面對嚴厲的身體禁錮，小說中的人物展現生存的意志，以空間為基礎，從身體與心靈的辯證中尋找出口，通過想像主體與意象的同構，兩位作家因此在意象世界中暫時的平息了人世間的不幸。

關鍵詞：梅濟民、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火燒島風情系列》、空間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7年6月9日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與政治大學圖書館所主辦之「陳芳明榮退研討會暨人文講座成立座談會」。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筆者受益良多。審查人意見已盡量在論文架構之內修改，未盡之處，只好待來日努力再述，謹此致謝。

Imprisonment & Salvation:

Analysis of Shu Chang's *The year at the Brothel* and Mei Ji Min's *Fiery Island Series*

Hou Ju-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oth Shu Chang's *The year at the Brothel* and Mei Ji Min's *Fiery Island Seri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90's. The two works are based on the two writers' own experiences (military / freshmen) in the martial law period, writing about the body in two spaces, "Brothel" and "Green Island Prison," respectively.

One being an anti-communist fortress and the other being an evil island for imprisoning criminals, Kinmen and Green Island both has symbolic meaning which is counter to Taiwan's. Even though facing the inability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verse the spaces, the writers have their own subjective emotions and thoughts. Whil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degrading notion imposing on them, the writers were also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issue of self-exist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image of water in the two works conveying the writers' craving for freedom, desire, knowledge and life. In the calling of water's original material image, the both two writers unified not only the primitive qualities from the water itself, but also the desperation to live in the isolated island, and rewrote the way the state machine symbolized space as well. When facing the severe imprisonment of the body,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show their will to survive; moreover, on the basis of space, the characters' searching for a way out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imagining the co-construction of subject and image, made the two writers temporarily subsided the worldly misfortune in the image world.

Keywords: Mei Ji Min, Shu Chang, *The year at the Brothel*, *Fiery Island Series*, Space



禁錮與救贖

——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火燒島風情系列》探析

一、前言

舒暢1948年入伍，1949年隨著軍隊來台，1963年退役，退役後便獨居在陸軍安排的單身宿舍，專事寫作。1981年發表的《院中故事》以他所住的軍部大院為背景，寫出一群四九年遷台者的孤獨與邊緣。開始寫作《那年在特約茶室》時他60歲，該作品原為1991年1月15日至6月5日於《中央日報》副刊連載的小說，¹內容敘述一群駐防在金門的官兵與當地特約茶室的故事。同樣是根據其自身經歷寫作，一樣寫出了大時代下遷台軍人的荒謬處境，只不過《院中故事》寫的是退役後，《那年在特約茶室》則是在役時。

《那年在特約茶室》的背景模糊，本書對戰事本身毫不關心，情節重在鋪陳特約茶室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軍中生活的描繪以及人物的存在處境才是本書重點，書中所呈現的軍人生活荒謬、虛無，全然沒有大兵身處戰場上的雄渾英勇，取而代之的是在特約茶室的調情說笑，突顯了軍人在反共大旗下的無奈和空洞。「這些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左的軍中圖像，才是歷史的真實」，²解嚴前的時空環境自然容不下舒暢筆下的特約茶室，解嚴後的《那》因此在台灣贖回歷史記憶的九〇年代，如楊照所說，重建了台灣「軍中文學」的一條大路。³

本書自序便清楚的定位本書：

-
- 1 原為短篇小說〈嗨，妳幾號？〉，後於1988年9月改寫為長篇小說《那年在特約茶室》，並於1991.01.15-06.05在《中央副刊》連載，同年由九歌出版。本文使用版本為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台北：九歌出版社，1991.09）。後續引文出自此書者，直接於內文中標註書名及頁碼。
 - 2 楊照，〈重返離亂時代——評舒暢的《那年在特約茶室》〉，《文學的原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01），頁105。
 - 3 同註2。

對軍人來說，最殘忍的不是戰爭本身，或者死亡；而是在「等待戰爭」的那種莫名的煎熬。也不比尋常可以一走了之，軍人對戰爭的等待是放下一切，要等下去。

自大陸來台的一批——不，幾十萬人中絕大多數的光桿軍人，一直就活在舉目無親的「等待戰爭」中，那不是一年兩年的等待（當時流行一句自嘲的話：我們是無「妻」徒刑），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⁴

根據范銘如的研究，五〇、六〇年代文藝創作，乃是不斷創造所謂「軍愛民民敬軍」、「大無畏」的金門精神，甚至當地人也一同參與了戰地神話的塑造。⁵時至九〇年代，以當地駐軍身分所寫作的本書與前期寫作的金門作品大相逕庭，書中呈現的是戰地神話的「背面」，指出跟隨著國民政府離散來台軍人們不得結婚、難以覓偶又無法逃脫、不得返鄉的困境。特約茶室在戰地金門成為了「那天地中的天堂」（《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成為身體乃至於心靈的救贖之地。此間所寫出的焦慮以及殘酷的精神磨損，很顯然迥異於此前強調奮起的精神力量的作家。

1943年隨祖父母來台的梅濟民，1955年因「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導等」罪名入獄，判有期徒刑17年，服刑20年。期間監禁綠島，出獄後撰寫《荒島血淚》、《荒島玫瑰》、《荒島流雲》、《荒島幽秘》（本文簡稱《火燒島風情系列》）⁶（1993）小說，以自己為藍本，書寫白色恐怖的歷史。儘管梅

4 侯如綺，〈司馬中原《最後的反攻》中「性」的書寫探析〉，「2012女性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2012.03），曾引用胡台麗，〈芋仔與番薯〉，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02），頁302的研究對當時軍人的無妻狀態的原因有過描述：「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結婚條例」規定，未婚來台的士官兵早期在部隊裡不得結婚。至1956，只有滿28歲的軍官才可結婚。1956年起允許有技術滿28歲的士官結婚。1959年起所有的士官滿28歲皆可結婚。至於士兵則要等到1961年以後年滿28歲才可成婚。俟1961年，大多數的士官兵都已經三、四十歲以上，已經較正常結婚年齡超出許多了。此外，除了國家的強制規定之外，另有其他因素影響當時軍人的婚姻狀況。一是軍中待遇極低，積蓄有限，無財力成家立業、二是低階士官兵本身因為期待成功的反攻大陸，不想結婚、三是人地生疏，找對象困難。故多年下來未婚的比例偏高，從1949來台至1990年未婚者，估計就有11.2萬人。這龐大的未婚人口，自然造成社會問題。

5 范銘如，〈後山與前哨——東部與離島書寫〉，《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07），頁210。而她的論述也指出至八〇年代以降，陳長慶、吳鈞堯、黃克全等金門作家才大幅度地展開了新的金門書寫向度。

6 梅濟民，《荒島血淚》、《荒島玫瑰》、《荒島流雲》、《荒島幽秘》（台北：當代文學研究社，1993.06），梅濟民亦為發行人。後續引文出自此書者，直接於內文中標註書名及頁碼。

濟民的《北大荒》受到廣大讀者歡迎，也被列為中學生的輔助刊物，1981年時《北大荒》已經是第十二版，但學界對梅濟民仍舊非常陌生。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本以他為研究對象所撰寫的〈梅濟民及其作品研究〉（2009）即指出梅濟民的文學史上的位置是「沒記名」，突顯他受到忽略的情況。⁷梅濟民1955年入獄，開始發表是在監獄中投稿，他的創作大部分刊登於《中央副刊》，《暢流》次之。投稿得到的稿費對於四〇年代由祖父母帶來台灣，沒有親人周濟的梅濟民來說有很大的幫助。作品集結之後，梅濟民出版了他第一本作品集《北大荒》，1969年梅濟民替《北大荒》寫序時他仍在獄中，序中只寫自己在台東，六年前「生活在太平洋中一個寂寞的小島」，但實際上這兩個地方分別是泰源監獄以及綠島監獄。我們很難想像，在他失去自由的時光裡，他替《北大荒》所寫的序仍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我把整個的生命都看成是一片美的律動，人生的苦樂是靠自己安排的；這是一門重要的生活藝術」⁸這又該是如何令人悲傷的心靈風景？而他又是如何能自生命中的苦境被救贖？一直到他發表了《火燒島風情系列》四書，才表露了他白色恐怖中莫名遭囚禁20年的經歷，其時已是1993年。

舒暢1949年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台，解嚴後出版《那年在特約茶室》（1991），寫下戰地孤島中「特約茶室」的特殊歷史；梅濟民1943年隨祖父母

7 此本碩士論文為：吳慕潔，〈梅濟民及其作品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由於政治犯的身分梅濟民一直相當低調，這使得他的資料與訪談都無法得到全然真實的梅濟民，甚至於連他的出生時間都難以確認。不過由於獨特的機緣，吳慕潔得以拜訪梅濟民的遺孀林秀淑女士，其論文有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者不可忽略的研究。關於他的生平資料常常出現不一致的情形，吳慕潔特別說明探究梅濟民究竟於何時出生。根據吳的說法，由胡建國主編，〈梅濟民小傳〉，《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31輯（台北：國史館，2007），頁404-408提到他在身分證上的出生年為1927年。吳慕潔和梅濟民妻子林秀淑女士訪談時則提出疑惑，林秀淑女士修正說他的出生年應為1937年。1927年是梅濟民祖父為了多領一份軍餉故謊報多了十歲。但奇怪的是，實際上不足歲的年紀，究竟是幾歲到幾歲就讀台大中文系實在難以推估，包括梅濟民的妻子自己在整理國史館小傳時都不清楚。除此之外，讓人覺得迷惑的還有《北大荒》。因為梅濟民追憶東北童年的散文《北大荒》中常常有超齡的經驗，所以若企圖要以他的作品來推斷生平，則很容易感到他的作品充滿想像的迷障，我們可以在作品中看見他本人的色彩，但是卻無法確定是否為他本人的經歷，究竟那是來自於他的祖父母？還是他自己？一如張冷所說：「他有時真覺得自己是七老八十的人，和他說話會把人弄得迷糊了，因為他話中的『我』一忽兒是他祖父，一忽兒又回到了他自己。等他發覺，只好再加以解釋，然後訕訕地說：『我已經是三個人的化身了。』」張冷，〈這一代的鄉愁——訪梅濟民先生〉《幼獅文藝》296期（1978.08），頁172。這使我們弄不清梅濟民究竟是少年老成，亦或是他出生時間比1937年還要早。

8 梅濟民，〈我寫《北大荒》〉，《北大荒》（台北：旗品文化出版社，2004.08），頁8。

來台，青年時期成為政治犯前往火燒島，寫下以綠島監獄為背景的《火燒島風情系列》作品。「火燒島」的存在來自於戒嚴時期的政治控制，「特約茶室」乃是來自於「等待戰爭」的無「妻」徒刑，兩者都是一種肉體的禁錮與操控。本文乃試圖彰顯離島空間特殊的歷史情境，並探究兩位外省作家藉由空間的重寫，所呈現的心理辯證過程與生存力量，從而表現存在主體的創造力。

二、「島」與「孤絕」：金門與綠島的任務

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的《火燒島風情系列》同樣發生在台灣本島以外的場景：金門與綠島。這兩座海島邊陲的孤島，並非是作家所創造的獨特場景，而是台灣有獨特歷史意義的地方。戰地金門被賦予「反共復國、保衛台灣」的目的，火燒島是替台灣本島隔離了政治犯，他們都拋去了本身的自然意義，成為威權時代下具有示範和象徵意義的島嶼。軍隊與監獄，是現代國家機器操作其意識形態的特殊場域。其中成員的行動都會受到特殊的制約，以下便分別敘述兩位作家筆下的島嶼。

（一）舒暢筆下的「島」與「軍事化管理」

金門介於台灣與大陸之間，也陷於冷戰結構和國共內戰間，由於時空的因素，造就它在兩岸以及國際位置中具有獨特的重要性。而金門也如此產生了它的「價值」，擺脫不了「工具性」的孤獨命運。

根據宋怡明的研究，金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衝突戰爭期間反共復國的前哨站，故高度軍事化。金門的軍人人數多於當地住民，其軍事化深入民眾生活，甚至包含女人的身體都在控管之列。而此所指「女人的身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約茶室」中的女性。⁹ 金門特約茶室的辦理，乃是來自於大批軍人進入金門之後對當地治安的影響。軍人駐守金門而失去家庭的慰藉和約束，當地休閒娛樂稀少，軍旅生活枯燥寂寞，軍人騷擾甚至強暴當地居民婦女時有所聞，為求安定軍心，降低犯罪，因此由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

9 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8），頁5。

將軍同意策畫設立「特約茶室」。特約茶室的女侍應生是來自台灣的自願者，在金門工作兩年後返台。「特約茶室」的出入狀態和侍應生都有所規定，例如非軍人不得入內、購票須出示軍人身分補給證、不得攜帶武器、每張娛樂票限定三十分鐘，違反規定或滋事者移送軍法論處等。而侍應生則是規定不得接待非軍人、不得洩密、不得擅自離室、每星期需接受軍醫抹片檢查，定期抽血檢查等等。¹⁰ 這些都是將身體建制化，納入管訓的系統。茶室的「特約」之名標誌了其特殊性質，私領域在金門亦是公權力操作的一環。

然儘管如此被管制、規範、約束，舒暢的《那年在特約茶室》仍指出了這樣的矛盾：「這些人性纏捲的世界，和那些單調沒有生命的戰爭意識是不能相容的」（《那年在特約茶室》，頁105）當我們進一步的將金門和舒暢筆下的遷台士兵們對照在一起時，我們也發現他們所呈現的特殊隱喻性意義。舒暢的作品不多，此前的作品多有超現實主義色彩，後來的《院中故事》和《那年在特約茶室》則是回歸歷史現實的作品。《那年在特約茶室》是他在解嚴後追溯昔日戰地生活所撰寫，駐守金門的軍人當然還有許多來自本島的「本省人」，不過舒暢的重點集中在他所寫的那幾位軍人：連長、副連長、麻子、徐立功和未曾真正出场的王禿子。他強調這些四九年遷台的軍人們，都是在「等待戰爭」中磨損、痛苦和消耗生命，舒暢以自身為藍本的身分再現書寫，無疑是一種指控。

當初由於一位兄弟，用刀片割掉生殖器，作為一種無言的抗議，這才成立茶室解決「性」的問題。其實「性」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過去的軍隊比現在要多上十倍，何以那時不成立特約茶室呢？……眼前沒有妻兒子女，家鄉音訊斷絕，你也聽過大家自嘲「前無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傷心話。手中除了那支槍外是一無所有，等到放下那支槍，鬢髮斑白時，仍兩手空空。大家面對的是一整無奈的絕望。……大家慢慢感到那些空泛的宣傳，對待那種絕望無能為力時，只好——（《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10）

10 陳長慶，《金門特約茶室》（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12），頁15。

兩岸對峙的戒嚴情境下，遷台軍人以全副的身心奉獻軍隊等待戰爭，只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在以「勿忘在莒」為號召的金門政治環境中，他們感受到的是身與心的違逆，一方面想要回返原鄉，承受思念和孤獨；一方面又勞動操練，服從命令指示，整戈以待。若如此情形只有一天兩天，那麼身心的壓力交迫還可以忍耐，但是在不知盡頭的年月中，這便成為一種難以排遣的焦慮、使人發狂的折磨。

更進一步的來說，早在1950年晚期，美國的台海中立化政策已經使得金門無法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從純軍事的的角度來看，金門不再是戰略要地，它的重要性實在於政治意義上。¹¹ 宋怡明指出，為了維繫台灣和大陸的象徵性連結，讓金門成為防衛台灣的必要之地，蔣介石故意把大量的部隊部屬在金門，若中共成功攻下金門也將重創國軍，嚴重傷害台灣的民心士氣，故蔣介石在金門大量駐軍的安排，是為了迫使美國防衛金門而做的決策，由是之故金門也因此成為了全球冷戰的一環。¹²

金門的政治性象徵意義，進而影響金門當地的軍事化生活，五〇、六〇年代金門民眾被併入武裝民防隊之中，從監視、防衛、勞務、情報收集到宣傳、照顧傷患等後勤活動都被體制化，同時也必須要給予民眾政治教育和軍事操練。七〇年代推動戰鬥村，民防隊甚至因此要予以武裝，並配合軍事作戰展開建設工作以達成作戰要求。然而對照六〇年代中期以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逐漸動搖，七〇年代中共加入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鄧小平上台著意於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相對金門的軍事威脅降低。相較於台灣本島因遭受國際外交重創擠壓出內部的政治反省，台灣政壇在革新保台的口號下風起雲湧，但我們卻在金門看到背道而馳的政治軍事光景。何以要加強金門軍事戰鬥化？宋怡明指出一是為誇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的威脅，以穩定逐漸動搖的國際支持，一是建立國民黨政府國內統治的正當性，¹³ 故而動員大批的民力軍力，以支持全球冷戰下的政治角力。在政治角力的張弛之間，金門因此既重要

11 同註9，頁104。

12 同註9，頁58。

13 同註9，頁145。

又孤獨，它的重要來自於它在國府冷戰視野下確立了重要的操作性位置，孤獨乃是因為被定位為「第一線」的前哨，也因此「身不由己」的無法被納入台灣七〇年代的政治反省；而《那年在特約茶室》中人物作為政治性操作的一環，自和金門的處境相互隱喻。

（二）梅濟民筆下的「島」與「監獄控制」

另一島嶼火燒島，同樣具有特殊性的位置。火燒島從日治時期便是一個整肅流氓的牢獄。後國府來台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監獄時期，一是1951-1965的「新生之家」，二是1972-1987的「綠洲山莊」。1967-1987則加入流氓管訓及「自強營區」。¹⁴梅濟民被監禁的時間為1955-1974，第一階段關到第二階段，正和《火燒島風情系列》王銀的移動相符。小說開始是主角王銀移監到火燒島開始，中間再度到台東泰源監獄，後歷經泰源監獄事件，¹⁵再度回到火燒島，彼時火燒島已經改變為不只監禁政治犯的「綠洲山莊」，與綠島的監獄史正相符合。

綠島管理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稱政治犯為「新生」。台東和綠島之間的黑潮¹⁶是火燒島天然的圍牆，不僅新生要進入便已經曠日廢時，家屬探監也要費盡千辛萬苦。¹⁷波濤洶湧的海浪形成的防衛隔離了罪犯的自由，也使得台灣本島隔絕了這些具有「危險性」的罪犯。使得綠島成為一「集中營」，方便軍管、改造、監控。

14 陳玉峯，《綠島解說文本》（台北：前衛出版社，2015.07），頁84。

15 根據陳玉峯《綠島解說文本》中提到，1967年之後新生離開綠島，政治犯的監獄被警備總部改設為「第三職訓總隊」，開始管訓流氓，綠島成為「大哥島」。然而，在綠島人權園區展示牌說明文敘述，「1970年彭明敏成功逃亡瑞典的消息，鼓舞了長期在泰源監獄中，醞釀武裝革命的年輕政治犯。同年的舊曆年初三，鄭金河等人奪取槍枝並刺殺一名獄方人員，卻不及佔領通信站台與車輛，行動失敗。逃亡山區的他們受到軍憲警圍剿，不久被捕」。因此事件之刺激，1972年，綠島再次成為囚禁政治犯的惡魔島，政治犯移監回綠島。見註14，頁105-106。

16 黑潮在台灣東部與綠島之間，是偏在綠島西側的最大流速線，在古代或非動力船時代，遇上強風便易形成船難，見註14。

17 被監禁12年的政治犯張振騰回憶錄中便寫出自己家人探監的經驗，由於五〇年代台灣西部到東部的交通未開發，自台中經由高雄到台東，轉班次就需花費六、七個小時，到台東的成功漁港進入綠島，要經過水流快速的黑潮，坐漁船要花費三小時以上時間。綠島只有一家在南寮的旅行社，到新生訓導處需要步行兩個小時才能探監。因此，探監往返約要花上三天的時間。張振騰、張翠梧著，《綠島集中營》（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07），頁52。在梅濟民《荒島血淚》中甚至提及，「有年邁的父母來看孩子，小漁船在海上漂搖一半，年邁的老母親就因受不住暈船氣絕身亡。」而感嘆殘酷的太平洋，竟做了時代政治的幫兇（頁191）。

感訓工作是誘導和威嚇並重，一方面鼓勵表現、監察言行思想，給予減刑的承諾，一方面又依獄中表現給予處罰。違反「正確」思想，不夠服從者關禁閉處分，進入牢中之牢。為求改造危及統治權的「不正確」思想，採取思想控制以及勞動操練各半的雙重手法。思想感訓是以討論、上課、考試、考核言行等方式灌輸反共抗俄思想；身體勞動的內容則是建設綠島、維持生活。¹⁸早期的新生甚至必須負擔綠島的基礎建設，後來的勞動還有包含砍材、種菜、養牲口等，勞力的沉重使得他們無法再多做思考。

火燒島和一般監獄最大不同在於活動空間。火燒島除有層層防哨之外，驚險的海流便是它天然的障防，躍海逃亡將會葬生海窟，比之銅牆鐵壁更難逃跑。天然險惡的自然環境，也是新生勞動中需要克服的生活場所。所以新生勞務繁多，勞動時的活動區域廣大寬闊，相對一般台灣島內的監獄較為「自由」。然遼闊靈秀的海洋，對以監禁為任務的惡魔島來說，意義卻僅在於他是可以禁閉的圍牆，讓人感覺恐怖統治監禁的冷峻與殘酷。

白色恐怖中枉屈入獄者眾多，在「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可漏掉一人」的信條下，梅濟民是其中一例。關於梅濟民所涉入的案件說法頗有差異，吳慕潔訪問梅濟民遺孀林秀淑女士時，她提到梅濟民在當兵時有一天在軍中宿舍的牆面上出現了「打倒蔣中正」五個字，經查和梅濟民的字跡很像，梅因此入獄。而根據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調查梅濟民案應是因為涉及「空軍四四一六部隊趙星吾叛亂案」。趙星吾為湖南衡山人，因為對國民黨在台統治不滿，常常偷聽對岸廣播，批判政治，甚至煽動空軍同袍投共。判決書上提到，趙星吾把這些想法講給同袍梅濟民聽，而梅濟民知情不報，後來趙星吾判處死刑槍決，他則因「明知匪徒卻不檢舉」和「以不實文字為匪宣傳」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¹⁹所以，不管兩者中的哪一項，都是無辜的池魚之殃。如此投射到小說中的主角遭遇便頗為類似，王銀原

18 曾為綠島新生的張振騰，追憶自己初到綠島的勞動工作包括建築圍牆、蓋克難房、整理營舍、美化環境、搬運補給品等。由於交通不便，苦行搬運沉重的物品，在炎陽下煎蒸，非常辛苦，而勞動活動也使得「新生」沒有時間再做腦力思考。見張振騰、張翠梧著，《綠島集中營》，頁29。

19 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人本教育札記》312期，頁93。

在台南空軍基地充任機械人員，當初以為總部談話後就能歸來，最後卻被判了20年徒刑；原本在替國家培養空軍，卻不明不白的落得了叛國罪名。心想著為何不當初就死了的王銀，心中憤恨難平，常處於精神失常的崩潰邊緣。

精神的壓迫不只在於橫遭牢災的痛苦。在孤島中生死由「天」，聯外消息阻絕，一切都不能以常規邏輯判斷，犯人在監獄之中每每有所變動，移監還是槍斃都不可知。小說中敘述風聲鶴唳的傳聞在難友之間流傳：新生伙食委員遭到政工密告把魚排成了五星狀是為和大陸國慶隔海同歡，因此被押回台灣判處死刑（《荒島血淚》，頁109）、或甚是荒謬的謠言著「國民黨要把火燒島的政治犯偷偷遣送大陸，交換早年被俘的軍隊」（《荒島血淚》，頁189）等等，飽受朝不保夕的恐嚇。加上新生們每逢10月還要籌劃舉辦相關慶祝活動，以向領袖祝壽。歡樂的背後潛藏恐怖，因為「誰敢不笑、誰敢拒絕表演」。（《荒島血淚》，頁112）孤島中這些恐怖矛盾的生態滿是荒謬，不能以理性判斷，往往又更形加重了新生的精神負荷。

另一方面，也因火燒島地處孤絕，對官兵來說也是具有獨特生態的場所。小說藉由張班長之口透露：「除了一部分政戰人員是真正的骨幹，哪一個不是經過『政治篩子』篩下來的二等貨」（《荒島血淚》，頁53），因此在這天高皇帝遠的小島上得過且過。小說且敘述行為卑劣的士兵，要求伙食新生「納貢」給食，回台灣本島又向新生家屬勒索；隊長兼輔導官的長官握有大權，能處罰新生，或是會向家屬收賄。官員的卑劣，對於和外界音訊隔絕的神祕火燒島新生來說毋寧是雪上加霜。

外在的環境如此惡劣，還有一些來自個人的特殊原因讓梅濟民陷於孤絕之中。1955年入獄，17年後梅濟民刑期已滿，因沒有保人不得釋放，硬是關到20年才由當地教會牧師保其出獄。根據梅濟民妻子的訪談透露，「因為那個年代梅濟民的祖父身分、地位均不容許梅濟民是政治犯，所以躲都來不及，梅濟民說：他的祖父母怕被沾染到，所以不敢來保釋，之後就帶著所有的錢到泰國去了」²⁰梅濟民由祖父母帶來台灣，在〈這一代的鄉愁——訪梅濟民先生〉的訪

20 吳慕潔，「附錄二：梅太太林秀淑女士訪談錄·2009年4月5日第二次訪談紀錄」，〈梅濟民及其作品研究〉，頁128。

談中看來他與祖母的感情應是十分親密。不過他沒有親人安慰探視甚至到刑期已滿都無法出獄，如此的遭遇已經超乎我們對於人情的理解和判斷。他在小說中寫下：「『匪諜』在這個高唱反共的時代裡，是人群中最卑微的一些。甚至連他們的親友朋友都遺棄他們，惟恐沾到一點兒邊」（《荒島血淚》，頁8）又該是多麼沉痛的自我告白。

在綠島監獄中的新生們政治成分複雜，也有不同的政治身分選擇。或共產黨、或台獨分子、或忠貞的國民黨員、或韓戰的「反共義士」²¹、或是沒有特定政治主張而無辜牽連者等等。王銀自言「窮又來自軍中」（《荒島流雲》，頁19）的身分，成為一種「獄中階級」，使他在政治犯群體中被隔絕。再者監獄之中也有黨派規分，成分相當複雜，獄中的人際關係一樣逃不開告密與排擠。從《火燒島風情系列》中看來王銀有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操，但不屬於任一種政治選擇裡，而他的孤獨也在於此。自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一文中其他受刑人的訪談中可得知梅濟民在綠島監獄中的確是相當憂鬱、安靜而低調，似能當作一佐證。

不論是《那年在特約茶室》中的金門還是《火燒島風情系列》中的綠島，作為政治動員場所的島嶼，都和小說中主角身不由己的無奈相互隱喻。身分是複雜的，他們是軍人／政治犯，也是思鄉的離散者，孤絕的島嶼、孤絕的心靈，拘束或囚禁於這海疆深處殘酷的精神屠場，孤獨的靈魂又如何尋找靈魂逃逸的管道得到救贖，則為下節所探討。

三、逃離孤絕而渾沌的禁錮陰影

段義孚的《逃避主義》一書曾指出人類的逃避的對象，有自然、文化、混沌與人類自身的動物性與獸性。以文化一項言，如逃避苛政、嚴厲宗教等；以

21 張振騰的《綠島集中營》中曾回憶：「韓戰之後在中共俘虜中，經台灣與美國互相配合下，成功達成所謂『反共義士投奔自由』的戲碼。有一萬四千名俘虜選擇『棄暗投明』要求來台灣。使國民黨在國際上贏回大面子。這些俘虜抵達台灣後，分發到各部隊服役，但結果這些俘虜，發現與當時所言出入甚大而在軍中大發牢騷甚至抗議。國民黨當然不能容忍這種舉動，而將這些所謂『頑劣分子』，集中到綠島接受感訓。人數約有五百餘人。他們在綠島時說感訓，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們上課或其他活動，更嚴禁與新生說話，嚴密控制言行，除了洗澡外很少到營舍以外地走動，等於監禁在比較寬鬆的監獄罷了」（頁46）。

混沌一項言，則是因人們對於混沌、不清晰的狀態感到困惑費解，試圖尋找清晰和明朗。²²

不管是《那年在特約茶室》的「等待戰爭」或是《火燒島風情系列》的「等待釋放」，都是生命陷入長期的困頓，不知何時停止，進無可進，退無可退的混沌狀態，這是筆者觀察這兩部小說的第一個層次。

而金門和綠島兩個荒陬之島，是人物實際的生存空間，同時也是兩位作者生命狀態的象徵。當我們把時間的跨度再推寬廣些，那混沌的狀態實不止於舒暢於金門、梅濟民在綠島的時空，更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與自身生命經驗上亟待詮釋的陰影和傷害，而這是筆者所觀察的第二個層次。

就如段義孚的主張，混沌的狀態使人們寧願採納抽象的模型，也不願意接受毫無頭緒的現實。清晰與明朗，會給人「真實存在」的感覺，但是也正由於人類內心與生俱來的逃避心理，才推動了人類文化的創造。²³ 我們若以此來體會舒暢與梅濟民，那麼也能理解這樣來自生命的書寫。

（一）逃離戰爭的混沌陰影——肉體性愛的麻醉、無法收編的人性

前文已提及，舒暢於1963年退役，早在1981年他就寫下以榮民為主體的《院中故事》，清楚的表現出老兵身分在台灣社會中的邊緣化困局。在該書序中舒暢說明了《院中故事》的背景，其文字流露濃厚的憤懣以及無奈之情：「社會上對這些人漸漸遺忘了，就像當年的垃圾場一樣……他們喊這裡是精神病院，或者木乃伊陳列館；但是他們遺忘了，這裡面的人都是從社會的參與中（甚至拋頭顱灑熱血），撤退下來的。」²⁴ 這一段話突出兩個問題，一是軍人長期的鄉愁和在軍隊意識形態的重壓控制下空轉青春歲月，導致精神無法穩定；二是軍隊生活與現實社會長期隔絕，他們和社會有隔閡、群眾對他們不甚了解，特別是低階退伍軍人在經濟方面的弱勢，在重利的工商社會中亦難以被

22 周尚意，〈譯者序〉，Yi-Fu Tuan（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6.04），頁12。

23 同註23，頁12。

24 舒暢，〈像上下車的乘客不斷演出（代序）——院中故事的背景說明〉，《院中故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5），頁6-7。

尊重。舒暢特別以括號說出軍人的犧牲，以強調群眾甚至遺忘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貢獻。故從序言中我們可知舒暢對榮民問題的觀察相當早，且他恐怕也早已了解這種情況隨著時間流逝、榮民衰老，只會更為變本加厲。

陳長慶在金門的田野調查記錄曾如此分析駐守金門老兵的真實困境：

一些對反攻大陸失去信心、又長期在台灣本島服役的軍、士官，已經在台灣找到婚姻對象。而那些長久在野戰部隊服務，每隔一段時間便必須隨部隊移防駐守外島的將士，多數則伴侶難尋。²⁵

失去親人的遷台者缺乏現實伴侶的安慰與鼓舞，支持他們度過混沌、無法數盡的等待；而職業軍人更因為長期與台灣本土社會的隔絕，增加他們退伍後融入現實社會的困難。將所有期待盡數拋擲在軍營之中，最後便是由失望以至絕望。舒暢因此寫出老兵虛空的等待戰爭，心靈上宛如一片無盡荒野的景況：

多數的人，在長期口號的疲憊下，發覺全是虛無飄渺的空中閣樓，在幾十年的獻身中，對「人」所需要的現實面，是一無所獲的幻滅。（《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10-212）

在《院中故事》之後，我們更能體會舒暢的心境，也看出舒暢已經體會到老兵一生的殘酷耗擲和代價。國共戰爭的歷史性因素造成了老兵的獨特命運，一如副連長所說：

軍中的老兵包括你我在內，不死於戰場，也會遭淘汰。繼來的如不是職業兵，他們服滿兵役就會回到家庭，以及原先崗位上，他們的希望在社會上不是在營盤裡，也就不會出現那種絕望。（《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13）

當老兵消失，茶室也會消失。本於真實生活的體會，舒暢在小說中透過敘述者

25 陳長慶，《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頁194。

的清明之眼，預示了老兵們退伍後的狀況。老兵的情感無法整編、人類最底層的需求無法整編，愛既無處投遞，只好朝向慾來噴洩，舒暢就此突出了戰爭的陰影，也重新定義、理解了長期以反攻復國為號召的戰爭的殘忍。故《那年在特約茶室》可視為是八〇年代末的舒暢重新站在人性的角度，清晰明朗的評價戰爭對於老兵的傷害。

且更進一步的，八〇年代末已經確認兩岸隔絕四十年後，逝去的已經無法返回的事實。回顧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所寫作的八〇年代末期，老兵已經能夠返鄉探親，然而探親之後的人事全非，往往給老兵更深的嘆息，他們已經成為故鄉的異鄉人。這樣悲絕的幻滅感甚至一直到2005年舒暢的詩作仍可看出

只不過會飛的緣故／卻遭拒絕回到記憶之外的故土／落葉歸根……不得不背負一身不必鄉愁的鄉愁。²⁶

返鄉的結果是證明自己永遠無法「返鄉」，他只能將自己裝成一片枯葉，悄悄傾聽泥土（死亡）的呼喚，〈瘋〉吐露出成為「永遠的異鄉人」的那種難以逃避的荒茫哀情，令人傷痛。

因此無怪乎八〇年代末期的舒暢寫下五〇年代軍中歲月，所看到的荒涼必然更甚於奉獻與光榮；也如此，我們方可以理解舒暢所體會到的戰爭陰影是多麼巨大。這個陰影不僅是來自於《那年在特約茶室》中同袍的犧牲或是戍守離島的精神壓力，更在於持續四十年來國共內戰兩岸對峙下，永遠返回不了記憶中的故鄉與親人的無盡折磨。

舒暢早在六〇年代初期就提早退伍，五〇到六〇年代初期的台海局勢與軍人思考恐怕還沒有他在《那年在特約茶室》裡所呈現的那麼明晰。舒暢寫下「特約茶室」的特殊場景不僅僅是作者記憶的剪影，或是戰地「特約茶室」的再現，而是以此指出了戰爭背後無盡的空虛與幻滅，這是戰爭的荒謬也是人類自身的荒謬。於是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藉由肉體慾望的展演突出軍人的絕望感。他描繪赤裸裸的肉體景觀，以失去文明的動物意象來表現軍人們急欲

26 舒暢，〈瘋〉，《焚詩祭路》（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5），頁52-53。

到特約茶室去：「四周的人群，彷彿一片螞蟻，蠕擠在一隻蚱蜢的屍體上」（《那年在特約茶室》，頁31）。或是寫特約茶室即將撤銷時，引起大排長龍的消費，姑娘們還來不及起床便接連接客，進行中的、後面等待的客人，便權當春宮劇的演員和觀眾。舒暢用人性中的原始獸性寫出絕望，全然赤裸的身體性交，突顯國家軍隊雖想要整頓軍紀，卻也不能處理的慾望。不能逃脫的戰地空間，只能給予特約茶室的肉體麻醉；在舒暢的筆下，人們回到食色性也的人性底層，原始而荒蠻，所謂的文明、口號和訓練，都因此而變得無謂荒唐。無包裹的原始慾望，使得敘述者感到想要嘔吐，最無法控制與理解的終究是人性。

舒暢在其小傳〈也算傳說〉中說「有點像萬里尋親那樣，尋尋覓覓找小說，也找自己」，²⁷表現了他寫小說、也是尋找自己的創作態度，《那年在特約茶室》便是他在八〇年代末期時空中的自我抒情、尋找和理解。一如1998年舒暢寫同胞開闢險峻的橫貫公路，幾句話彷彿寫出自己的形象：「解甲異鄉不授田／處處拾荒的飢老漢／聞聲著魔／扔襖衫襪席 舞之蹈之／袒出紋刺誓言未退的／胸膛 頂起雪的頭顱」²⁸面對自我，舒暢不以鋤頭、斧頭，而是以自己的健筆，傲然的寫出洪荒之中人的生命與批判。

《那年在特約茶室》的書寫廓清並解釋了其時舒暢對此一影響1949年遷台軍人們一生的戰爭的理解。無法收編的情感和人性，終究和無情殘酷的戰爭相對；而人性本身使然，卻依然會重複歷史。《那年在特約茶室》中副連長思考：

「戰爭」又在哪裡呢？這個有人類以來的公敵，永遠沒有發言權為自己辯護，也沒有誰代一句說：製造戰爭的又是誰呢？只好黑鍋揸到底，認罪的默默承擔了。可笑的是，相信後世的跟我們現在一樣，站在砲口前來批判歷史，而不能自救。（《那年在特約茶室》，頁154）

舒暢固然抗議戰爭，重寫國共內戰的意義，不過他也藉此暗示了人性本身帶著

27 舒暢，〈也是傳說〉，《舒暢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05），頁4。

28 舒暢，〈焚詩祭路〉，《焚詩祭路》，頁96。

盲目和愚昧，自陷危險，卻又無法自我拯救。人類的命運因為人性內在的驅動而循環，人類自身是如此的荒謬，這是舒暢對於戰爭的詮釋，也是一種歷史性的詮釋。

（二）逃避冤獄的痛苦——跨越監禁的愛慾、逃離現實的幻想

梅濟民出獄時已經是1975年，當時台灣尚未解嚴。從五〇年代監禁到七〇年代，梅濟民和文壇自然不可能有所互動；到梅濟民出獄之後，政治犯的經歷和身分，更使得他相當低調，和獄友通訊留下的是通訊信箱，²⁹七〇年代末之後的14本創作皆為自印出版。解嚴前1978年接受張泠訪談〈這一代的鄉愁——訪梅濟民先生〉中，提到他體驗各式各樣的生活以幫助寫作，包括「請求到監獄裡去和犯人們共同生活」，或者是「沒有固定的寫作環境」，³⁰若不是在解嚴後知道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否則很難明瞭這都是源自於他真實的政治犯牢獄經驗。且根據九〇年代以降的台灣政治犯訪談，出獄後的政治犯並未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們往往仍受到情治系統的監視跟蹤。梅濟民的寫作之中雖未曾言及，但可揣測他在出獄之後仍會受到的壓力。

渡過了解嚴，梅濟民終於不再隱瞞他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身分，九〇年代梅濟民描述監獄的景況，有向世人撥開迷霧，揭露黑暗的作用。回望新生歲月，新生訓導處要使政治犯「新生」，如此真能夠「改造」新生精神，讓他們「重新做人」嗎？實際上在禁錮下的新生只會感受到憤怒和痛苦；尤其是政治犯的主體意識高而難以左右，不能「改造」而是更加「痛恨」。《火燒島風情系列》裡常常痛罵國共兩黨，表現監獄的恐怖生態，指出當權者的荒誕殘忍，人物王銀曾將自我命運的理解放在「政治標本」的警示作用中，而扁平化的乾枯標本，自然是指控牢獄監禁對豐富生命的扼殺以及突顯政治犯在社會上殺雞儆猴的作用。

然對照七〇年代的「回歸鄉土」浪潮、八〇到九〇年代政治結構的鬆動，

29 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人本教育札記》312期，頁96。

30 張泠，〈這一代的鄉愁——訪梅濟民先生〉，《幼獅文藝》296期，頁176。

梅濟民所創造的王銀雖為政治犯，實際政治態度上卻頗為明哲保身。在小說之中很難判斷王銀的政治理念，或也可說他並不相信任何政治信仰或傾向（共產黨／台獨），和權力保持距離。他傾向於人道精神，所以他會幫助同為難友的精神病患（教悔堂）、替孤兒院募捐、替窮困的政治犯家屬募款、號召替失血過多的產婦輸血。懷抱對於人性的基本信念，相信美與善，對窮困者予以幫助、對骯髒受苦者加以安慰、對危難者伸手救援，不論身分與階級，朝向一種宗教式的情懷。小說中王銀或也有幾次以情操號召、感動了其他獄友，可是他始終不是領袖型的人物，更不會結眾串聯。

在應該是充滿陽剛之氣的綠島小說裡，梅濟民反而以黑色羅曼史³¹的方式，用蘭妮、金鳳、玉蘭三位女性為主要情節開展出王銀的情感世界，而這也是小說裡最突出的表現。王銀多沉溺在個人的情海與思索之中，掙扎和三位女性情和慾的修羅場，敘事上幾乎朝向通俗小說的寫法。《火燒島風情系列》在九〇年代政治文學勃興的時空中卻是波瀾不興，其原因恐怕和他的寫法有很大的關係。本書的序雖說明這是「真實故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小說裡人物的塑造、情節的走向以及語言表達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讀者對該書真實性的信任態度。我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這部應該寫實控訴他20年政治犯生涯的白色恐怖小說，何以會成為一部黑色羅曼史，讓主角和三女性大談戀愛。

根據社會學家趙彥寧的研究，女性在外省流亡者的口中，常具有特殊的表現身分和心理慰藉。他曾透過榮民訪查指出，對不少抓伏來台的男性中國流亡者而言，母親早已無法接觸，或甚至難以再現。女性可在他們來台後的生命過程裡面與其社會能動性互相建構，故而創發出多元且往往矛盾衝突的日常生活倫理實作。³²這樣的解釋觀點啟發我對梅濟民作品的思考——但我並不以實際生活層面的實作來理解虛構的文學作品，而是將小說中蘭妮、金鳳、玉蘭三位女性，當作是個人心理、生理以及社會政治結構間的象徵性媒介。

小說中的女性幾乎都是熱愛王銀的，她們三位尤為代表。從前期入獄時女

31 此為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一文所提出，筆者認為用來形容總括《火燒島風情系列》的特質非常適合。

32 趙彥寧，〈親密關係倫理實作：以戰爭遺緒的男性流亡主體為研究案例〉，《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07），頁541。

友蘭妮成為沒有親人的王銀活下去的力量、到中期金鳳彌補了王銀在親情和愛情上的缺陷、後期玉蘭強勢的出現使得他終能出獄。周旋於蘭妮、金鳳和玉蘭間羅曼史般的情節裡，我們看到他們自愛欲中產生存活下去，不斷向上攀升的力量。

王銀小說中第一次想要尋死時，獄友小伊以獄外女友蘭妮的等待為開導他的理由，蘭妮是王銀情感上的安慰。後來王銀拯救了溺水的金鳳，金鳳稱王銀為哥哥，照護王銀，成為他的親人。之後在王銀的教導下，原來目不識丁的金鳳取得哈佛博士學位，完成王銀對於知識救國的抱負。如此傳奇性的情節使得本書的寫實性降到更低，不過這樣的傳奇卻是王銀理念的實踐；或不如說是梅濟民理想藍圖的完成。因為在小說中雖然一再的突出知識的重要性，但事實上知識所帶來的力量並不能使他在獄中「換得中國的未來」。如此一來，知識除了自我修養的意義之外，便沒有其他條路可走。然而金鳳以自由身突破了獄中限制，如金鳳所言「我要把你（王銀）的愛回報給世界」，她彷彿完成了王銀的理念，因此表現王銀的價值；可是她卻也僅止於學成歸國，並未在小說中有何具體的社會性功業。故金鳳的形象反而相當單一，徒留下安慰王銀，完成王銀理想的象徵性的價值。

而第三位女性是身分最奇特的李玉蘭，她是連指揮官都懼怕的特務身分。一方面他滿足了王銀的愛與慾，一方面又「監視」他，她傾倒於王銀的魅力之下，最後協助他找到保人離開綠島。梅濟民的小說對於「特權分子」的態度頗為曖昧，他們位高權重，能在黨國時代有特殊資源和關係，有正義感，能突破黨國的操控幫助弱勢的主角。也因如此他們和當權者權益相違背，有遭到殺身之禍的危險。梅濟民的小說不相信底層百姓本身的力量，反而會認為特權分子才能在亂世之中行人所不能行、發人所未發，而對於構成特權者的結構問題避而不談。李玉蘭的強權便是特權者一例，蘭妮和金鳳對於王銀深陷囹圄束手無策，充滿傳奇感的角色李玉蘭，卻可以拿出手槍和政治官僚「溝通」。

蘭妮、金鳳和玉蘭三個女性角色便代表了三種象徵性媒介，一是獄外的等待、二是親情的慰藉、三是權威的力量。她們兼具了心理、生理以及社會性的象徵功能，使監獄禁錮的王銀完整了自我。不論是梅濟民小說所寫的三位女性

情感與權威兼具的象徵，或是王銀在小說中自我要求的理性以及對愛的重視，實則和他所處的真實際遇相反。從梅濟民的訪談看來，愛國的空軍在白色恐怖遭受無妄之災，難以用常理來判斷；帶他來台的祖父母因為畏於災禍及身而遠走他鄉，梅濟民刑滿仍不得出獄。因此綠島監獄反而是人間理性與感情的極度挑戰，梅濟民在解嚴後不專以控訴者的面貌在書中呈現，而用三位女性成為情節推進的主軸，乃是以虛構跨越綠島監獄的殘酷和自身際遇的殘忍。

不過如此一來，不論是個人的情緒式的發洩或是個人際遇的象徵性投射轉換，都弱化了對國民黨戒嚴體制的總檢討，而是著重在個人的修為與解脫。梅濟民長期存在特殊的孤絕處境裡，幻想與想像自《北大荒》開始，一直以來都是他逃離現實的途徑。梅濟民所創作的小說裡，除了寫自身戀情的中篇小說《楓紅》外，《火燒島風情系列》恐怕已經是他最貼近真實空間的一部小說。然而這並非指所有具政治犯經歷的作家都必須投入當代實際的政治活動，或是積極參與任何想像共同體的建造工程；而是我們應當注意到，當一個人在面臨20年牢獄的人生幻滅，而能突破時空限制而存活下來的堅毅精神力與創作的力量。

四、水的想像與原始情感的呼喚

透過上述，我們知道金門和綠島在兩位作家的一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場景空間。自五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從堅定反共到空洞耗擲，他們穿越了從堅定到混沌的過程。在金門以及綠島的空間中，舒暢與梅濟民只能以駐軍／政治犯的身分被認識，代表著國家的集體意志，且不管他們願意與否，他們同時也是權力再製的一部分。不過對個體來說，空間本身的意義和集體的要求並不一致。³³ 背於透過國家意志所形塑的金門以及綠島，他們回歸了原始情感，從基本的情感之中汲取力量。

巴舍拉透過空間的物質想像，進入意象的層次，捕捉想像主體和意象同構的原初感知狀態。此節我們以水為主題，連串出相關意象：水、船、貝殼、海濱小屋這四種意象，探究作者主體的感知狀態、心理情緒和心靈反應，並進一

33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頁70-100。

步發現主體透過書寫以在現實情境上逃避並取得平衡，如上一節中段義孚所言人在「逃避」之後展現豐富的創造性，他們也從文學意象中脫去島嶼扁平的符號意義，在自然的物質力量中呼喚出存在主體的內在想像，創造豐富的詩篇。

（一）海：生命的呼喚

這兩部小說的空間場景都是海中島嶼，因此與海的關係相對親近。《那年在特約茶室》一開始，即點出海水的場景：

一片海水遠處那一方，薄霧紗帳上，模糊黑色的山影，以及連綿的海岸線，那在後方就是無垠的大地——我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那年在特約茶室》，頁5）

標誌出本書的人物身分，以及不得返鄉的生存困境。霧籠海水的寂寥，與人物戍守金門前線的憂愁相呼應，在戰爭與思鄉的煎熬下顯得黑暗沉鬱。然而，我們除了將之視為是現實的場景，卻也可以視之為意象的詩意空間。海具有孕育生命的特質，也象徵了母性。《那年在特約茶室》的22號戲言「我們祖先不是海鳥就是魚蝦，因為地球上先有水……」（《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93），便暗示了海水的象徵特質。

茶室位在叫「梅花澳」的小澳口。「澳」，是可停泊船舶的天然港灣，或也可做岸邊水流彎曲之處。是廣闊、流動的海水與人可以在安穩範圍中接觸的可棲之處。巴舍拉曾提出，自然界是母親的一種投影，尤其是「大海」，它對於所有人而言，是最偉大、最持久的母性象徵之一。³⁴大海是女性的身體想像，水是乳汁，大地在其子宮裡準備著溫暖而豐富的事物，乳房在岸邊鼓起，給予各種造物原子。³⁵這種女性身體的想像與暗示，正接合著在梅花澳中以肉身溫暖給予思鄉者撫慰的茶室姑娘們。

如舒暢所言，她們冒著隨時可能葬身砲火的危險，默默到前線和戰士生死

34 Gaston Bachelard（加斯東·巴什拉）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中國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01），頁195。

35 同註34，頁200。

與共，已是屬於一種奉獻。9號為和未婚夫買南山，以自己的肉體賺錢，不願意接受連長資助；33號願意為了副連長可以自戰地平安歸來而守節；25號和許立功無條件扶養37號和麻子的遺孤等等，因為她們的奉獻和情義，那鳥不語花不香，如大戈壁般的彈丸孤島，³⁶才因此讓老兵戰士們得以承受「等待戰爭」的長期煎熬。以身體穩定軍心不於潰散的茶室，在小說中成為了救贖與安慰的象徵，也正如水深刻的母性特質生長、滋潤著萬物。

海水意象也跟隨著小說中的情節變化。當9號瞞著未婚夫洪福財到茶室工作，事情未解決之時「海邊和低窪地帶，瀰漫起一層薄霧氣」（《那年在特約茶室》，頁41）；33號牽著情人副連長的手，靜靜望向海上，「一片湛藍的海水上，跳閃著金穗般的陽光」（《那年在特約茶室》，頁153）；為在砲戰中死亡的查如龍舉行海葬，「海上瀰漫著濃濃的稠霧」（《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35）；一直到砲戰發生，昔日頑固的連長因為查如龍之死，而放棄對茶室姑娘的固執偏見，擁有新的生命視野時，則是「霧已經褪盡了，藍色的海水上，撒上了一片片金色的陽光」（《那年在特約茶室》，頁252）。主體進入靜觀之中，海水亦承擔起人物的各種感覺，海水是情感的財富，飽含了人物的心靈。³⁷

當小說人物愁悒之時，海洋則漫起霧茫；當人物感到溫暖與清明之際，海洋便迷霧散去，湛藍寬廣。我們自海水意象的變化除觀察到海洋跟著情節的走向而有不同的面貌之外，且藉由士兵們與茶室女性的互動中，發現了女性堅毅、包容、重視情義的面貌。³⁸沙灘畔的茶室，海水包容的、沖刷海岸的特質，也嶄新了老兵們的心靈，呼喚他們的生命力量，或是對於生命的重新認識。

《火燒島風情系列》小說中，海亦是最重要的背景。禁錮在監獄的心靈，因為大自然而開放，受到洗滌。綠島監獄是開放式營區，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海洋「會賦與人一種奇異的慰藉」（《荒島血淚》，頁18）、把悲傷「寄

36 這是舒暢對於戰地金門的形容。環境的惡劣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情境，透過舒暢的形容，我們也可了解在當時戰士的眼裡心中金門是如何的面貌。同註1，頁3。

37 同註33，頁88-89。

38 關於《那年在特約茶室》女性形象的分析，可參考徐薇雅，〈舒暢及其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在該論文中她給予《那年在特約茶室》中的女性高度的評價，頁75-83。

與浩瀚的海天」（《荒島血淚》，21頁），「雪白的浪花就像環繞岸濱漂浮的牛奶」（《荒島血淚》，頁118）……作者不斷的在小說中描繪海洋意象，並重複敘述海洋給予王銀的心靈治療。

大自然的慈母呵！美感的賞賜，是支持他生命堅強存活的最大源動。滲透靈魂的美的慰藉，是平衡他無限苦難最偉大的慈祥力量。

大自然的美，以一種神秘超然的力量在拯救他。

他真的感受到，這荒島好像有一股力量在背後支持無助的他。

注望一下碧晶的晴空。

掃視一眼柔藍的大海。

他就會獲得無法言說的心靈安慰。……

浪濤的迸濺聲，山鳥的鳴叫聲，好像四周的一切都在關懷他，勸慰他。

（《荒島血淚》，頁22-24）

王銀因莫須有的罪狀遭到囚禁，判刑20年，由青年而壯年，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精華期。被丟入備受歧視的政治黑牢，如此非常理所能判斷的際遇，若沒有很大的精神力量超越自我，便會理性潰堤。《荒島流雲》中描述的泰源監獄的精神病患專用病房，便提示了政治患面臨精神壓力的另一個「出口」——瘋狂。由於現實所受到的侷限，心靈向非現實開放、擴張。憑著和大自然接觸的知覺，馳騁想像力，因此而支持自我的存在，加強意志。由自然的遼闊意象進入內在使之澄澈，由此得到安慰和支持，開啟新的視野。

如同巴舍拉所說的浩瀚感，不僅是面對宏偉景象的一種沉思，也是一種內在的感覺。私密領域裡的浩瀚感是一種高張感，是一個存有在一片私密之浩瀚感的遼闊景觀裡醞釀發展的高張狀態。這便是「感通」的原則，感通力量是不同的感官印象透過混合的力量進入了彼此感動的境界，是一個深刻而幽冥的整合體。感通接收了世界的浩瀚感，並將它轉化為我們私密存有之高張感。³⁹ 自

39 Gaston Bachelard（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2003.07），頁288-289。

然意象給予王銀神秘超然的力量，便是來自於這種浩瀚感。並且我認為這種自然感受甚至會內化昇華；日後王銀在四坪大、居住32人的泰源監獄監房中，他敘述自己竟也能入定似地進入想像「聆聽海濤」、「仰觀藍天」，在靈境中的「夢之島」逍遙，而平安度過死亡呼喚。由幻想自然產生動力，達到私密的心靈整合，面對生命的苦厄，已經成為王銀獨特的昇華之道。

海的母性意象並且與人物蔡金鳳結合。金鳳是小說中三位女性中最特別的，她具備母性特質，也彷彿是母親之愛的延續。當王銀從海中成功拯救了瀕死的金鳳，他的反應是滿心感動的面海跪在山道上傾訴：「親愛的母親！有生以來您這笨兒子終於救了第一個人」（《荒島血淚》，頁145）王銀跳入海中拯救溺水的金鳳，小說不止一次的被強調是王銀從海中撈出來的珍寶。金鳳是綠島當地女性，小說中且曾解開衣襟，擠出奶水為碰到毒樹的人物擦抹患部，這荒島土方突出了金鳳的土地性與母性特質。⁴⁰王銀形容金鳳「無知而美艷」，義無反顧地獻身政治犯王銀，王銀最後以傳授知識來提升金鳳，讓金鳳成為「荒島玫瑰」。這看似男性「施恩」女性的關係，被拯救的彷彿是女性，但實則是在女性拯救了男性。除了沒有家屬的王銀多年來由金鳳給予愛的安慰、幫忙打點關係外，王銀也曾想尋死，他總是在思及金鳳的付出與愛後，度過死亡的誘惑，金鳳有撫慰也有激勵的特質。

（二）舢舨與船：生命的渡者

巴舍拉認為，人在自身的深處具有流水的命運，水是過渡的本源。水的實體是流逝的，不斷流淌著的，對於水的物質化想像來說，水每分鐘都在死亡，水的苦難是無止境的。⁴¹當舢舨三度出現在《那年在特約茶室》，若非分離即為死別。一是查如龍的喪禮，渡舢舨海葬。另兩次則都是姑娘們返回後方，乘坐舢舨搭船。搭乘舢舨代表了離別，從此岸到彼岸，查如龍從生者的世界過渡

40 人奶可治癒毒樹並非是梅濟民所虛構，在胡子丹的回憶錄《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中即有提起人奶可以治好吃人樹，非常有效。小說中的毒樹，或是胡子丹所說的吃人樹，胡子丹解釋為麵包樹和漆樹，以人奶醫治為當地居民土方。梅濟民小說特別安排這樣的「土方」，無疑強調了綠島的地方性。見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台北：國際翻譯社，2009.02），頁116-117。

41 加斯東·巴什拉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頁10。

到死亡的世界；姑娘們離開戰地，回到有名字的後方。

島嶼和大陸之間的交通，莫不要透過舢舨，船是此彼之間溝通的橋樑，它代表了移動與交流。而查如龍的死亡與姑娘們的來去，則溝通了連長或說是對於娼妓的世俗性觀點。

連長篤信基督教，視嫖妓為邪淫罪惡。和連長親如父子，由他從故鄉帶來台灣的王建邦，因為娶了茶室的婦女，他氣的斷絕往來，可見其固執與成見。宗教的禁慾與操守，到了前線金門的非常處境格外困難，敘述者更調侃到了島上恐怕除了連長外跑教堂的都去跑茶室了。特約茶室設立在連長的營區，來自三教九流的人士與勾連著慾望的嫖賭，容易因龍蛇雜匯的複雜關係和人類的原始慾望而起紛爭，因此連長更是視為一個棘手的毒瘤。由於自身的「潔癖」，使得連長對這些人事糾纏束手無策。能游刃有餘溝通這黑白兩道，只好是出入賭場，知曉黑幫規矩的士官長查如龍。查在副連長的形容是：「好人中的好人，奸詐人中的奸詐人」（《那年在特約茶室》，頁95），但也因為他的義氣協助才有辦法解決這些紛爭。

因此好與壞、是與非、黑與白、聖潔與汙穢，在舒暢的筆下沒有絕對的界線。特約茶室乃至於金門戰地，其人間情義並非世俗以為的金錢關係所可解釋。查如龍之死讓連長領悟到「查兄弟」是在行神的旨意，並以自己的死亡轉變了連長視茶室為淫邪的觀念，接納茶室的姑娘、老鴇。連長悟出聖經的真義，必須通過入世，在生活中去印證，否則只是理念。查的死亡啟示了連長，而啟示是以肉身來證成。從一開始的固執拒斥到尊重接受，是自查如龍與茶室姑娘們來的轉變，載著他們的舢舨突出了他們由「渡」到「化」的意義。舒暢在〈另一座教堂〉中提到：「我在小說中，對她們只說號碼不提姓名，也是一份敬重，就像如來和觀音，也不是佛的名字。」（《那年在特約茶室》，頁4）正也呼應了將他們宗教化的象徵意涵。水的流逝如同生命，也是人的命運。

綠島海流、氣候的嚴峻以及海岸的礁石密佈，常使得綠島和外界斷絕往來，成為封閉的海外之島。加之為禁閉政治犯的場地，更使得綠島成為恐怖難以親近的孤絕島嶼。在梅濟民的筆下，則以不同的船，如軍艦、郵輪、探潛

艇，象徵這座孤島以及王銀與外界接觸的渴望。

例如軍艦帶青年學子參觀島嶼，也帶來難友的家眷探望；對來歷不明的潛艇，王銀一看到便興奮直覺的揮搖雙手，殊不知那可能是敵軍的探測。親人的探視使得船艦是親情安慰的象徵、未知的潛艇是恐怖時代的暗示，連接特殊歷史情境下政治犯的悲劇性。

而其中最特殊的是《荒島流雲》中被暴風雨吹上岸的希臘蒂摩斯號。豪華的蒂摩斯號因為被吹上岩礁，全船竟然相當完整，不過因為無法下岸也只能放棄。船上的設備豪華，甚至還有快艇、圖書室等等現代化的設施。王銀利用蒂摩斯號中的設施架設遊艇水道帶來便利。又蒂摩斯的藏書是歐洲出版品，也有政治性論述。新生訓導處因為缺乏外文作業人才，因此未曾檢查，和外界資訊隔絕的政治犯和金鳳都可以藉由這批書打開視野。王銀進一步將蒂摩斯號所拆卸的物品替金鳳蓋了收藏書籍的小屋，一是當作金鳳的書房，由閱讀而提升金鳳，二是此一小屋後來也成為王銀如「世外桃源」般的精神避風港。在暴風雨中，流動無邊的海水推送了蒂摩斯號，它讓現代設備進入荒僻的島嶼，它偶然且神奇地成為了新知與家屋的仲介者，滿足了孤島中王銀的生命渴求。《荒島流雲》中的船未有《那年在特約茶室》中渡化他人的生命境界，可是奇蹟似的海濤竟載送著「禮物」滋潤新生乾涸的精神，從另一方面也由船隻傳達出他們期待著被滋潤的盼望。

（三）貝殼與海濱小屋：愛慾的渴求與救贖

《那年在特約茶室》的茶室靠海，海岸淺狹，沒有石洞，因此貝殼便被沖上沙灘。小說中後來才到茶室，喜歡「使性子」的22號，在小說中最顯著的行動便是蒐集貝殼。

小說中對於22號的形象敘述是不成熟、孩子氣的女性。她在茶室不加票、不住夜、常常掛休息，似乎無目的般的不經心。常和當地茶館的張老爹一同談笑散步，在沙灘找尋貝殼，作為敘述者的副連長認為是一種營造父女親情的假象。

貝殼屬於「介殼」一類，對軟體動物有保護性作用；以物質形象而言，它

又如同雙唇、有張口說話的形象，表現出溝通的渴望。就生物來說，甲殼是保護自我，一方面又有著期待傾訴，寄託情感的形象，如此也和22號重疊一處。22號在《那年在特約茶室》中的角色相當特別，一開始和副連長有誤會，到後來副連長酒後亂性強暴了22號，而22號後便以「露水姻緣」解釋了這樣子的關係。在打了副連長巴掌消氣後，兩人又有親密的肢體互動，反而顯得柔情蜜意，22號也並不深入加以追究惡行。如此扯不斷理還亂，也暗示了未來她與副連長可能的情愛糾葛。這樣子的情節發展，幾乎讓人以為舒暢是男性中心主義者，對於強暴關係竟至默許，而沒有給人物應有的處分。

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本書的敘述者為副連長（我），副連長醉後的所有行為他一概都是記不得的，因此醉後到發生強暴，22號送副連長回營，這些都是透過22號陳述，敘述者（我／副連長）才知情。所以22號是否有隱藏還是編造，讀者其實並不清楚。因此舒暢似更想透過兩人的關係，強調那些情感的曖昧之處，理性所不能駕馳的非理性疆域。透過麻子（查如龍）與33號之口，大概都可知副連長有著自己都不清楚的「女人緣」，他雖是君子形象，情感上並不是屬於死心眼一類。

22號使性子的樣子彷彿是對情感的一種自我保護，卻也期待著愛。和張老爹一起聊天撿拾貝殼，對彼此來說都是一種親情的慰藉；離開金門要回到後方之際，還叮囑著副連長要幫她「找貝殼」，舒暢在此雖一貫的保持著他在小說創作上的留白，但顯然暗喻著她情感上的渴望。而副連長點頭答應，兩人相互凝視道別，隨後又將22號和33號的臉影在印象中交相重疊；可回顧副連長才在前不久和33號起誓盟約，隨即情感上似乎又要把持不住，也顯現愛的飄忽難料。副連長酒醉後對22號非禮的潛意識，22號從拒絕到接受的情感轉折，那開啟的貝殼雙唇正告訴我們舒暢所強調的愛的渴望、騷動與非理性處。

綠島的貝殼在《火燒島風情系列》中未有愛的象徵高度，是更實際的作為商品而存在。金鳳的孩子渴望著王銀和他們一同撿拾貝殼的願望始終沒有實現，貝殼對缺乏關愛的政治犯是奢侈悠閒的浪漫。貝殼實際的用途是由綠島新生們製作成貝殼畫，這是他們的生財之道。《荒島幽密》敘述綠島有四十幾位舉目無親的待保外省人，刑期已滿不得自由，半數已經精神失常，一些則是拼

命製作貝殼畫，企圖在火燒島當地買保人。⁴² 貝殼如間接的回歸到原始的貨幣功能，以交換理該得到的自由。尤其如王銀等，政治感訓考核未通過仍無法出獄，這些受刑人只得秘密行賄考核人。服滿刑期還不釋放受刑人，維護國家尊嚴的法律蕩然無存，一如黑幫擄人勒索隨意監禁，⁴³ 現代的民主法治成為虛偽的口號，貝殼可視為借喻式反諷，遙遙嘲諷了原始般野蠻非理的政治手段。

貝殼在《火燒島風情系列》中沒有保護、溫暖或是愛等作用的象徵意涵，能隱喻這些作用的在於小屋與山洞。前文已經提到，金鳳居住濱海小村庄的小屋是王銀的精神避風港：

這個小小的「世外桃源」，是西太平洋這荒寒海域最溫馨的一個去處，王銀每次來這的感受，都覺得好像承受著無限的溫暖，從身心一直到溫暖到冰冷的靈魂。……

王銀每次來到這裡，就好像進入一個溫馨的夢境。（《荒島流雲》，頁150）

有著食物、冰箱、洗衣機、發電機、廚具、家具等配備的小屋，並非是小屋內涵的真義。小屋由王銀所打造，金鳳給予王銀的安慰，讓小屋如家般的安慰著他受難的冰冷靈魂。對政治犯來說家是奢侈的，更尤其如王銀這樣離散者身分的1949年遷台者。小說中王銀除了愛人蘭妮，沒有其他親屬的探訪，屢屢在山間小徑呼喊想念山海隔岸的母親和弟妹，王銀失去的不只是身體的庇護，還是心靈的庇護，金鳳的小屋正調整了王銀的靈魂狀態。

巴舍拉談即家屋時提到，人類的價值不僅只有思維和經驗，日夢的價值，標誌了人性深層的價值。日夢甚至擁有自我調整價值的殊榮，他從自身的存在獲得樂趣。因此我們在新的日夢中，重新構成那些我們體驗日夢的處所。⁴⁴ 金

42 政治犯獲釋必須由官員考核合格並有保人作保。在白色恐怖之下，一般民眾對政治犯避之惟恐不及，找保人成為難題。本省人政治犯尚可找親人當保人，舉目無親的外省人政治犯只好用錢買保人。《荒島幽秘》即敘述：「很多官兵都在祕密中想法為他們牽線，買一個保人兩萬圓，有些士兵在島上一些窮困家庭中，只以八千圓就能找到，另外壹萬兩千圓都是牽線人淨賺的。」（頁64）。

43 此出自《荒島幽秘》中王銀氣憤地思考與批判（頁48）。

44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68。

鳳那如夢境般的小屋，幾乎可說是作者抵禦困厄命運的幻想，如巴舍拉所言：「家屋是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的最偉大的整合力量之一。這種整合中的基本原理，就是日夢。」⁴⁵當金鳳出國後，李玉蘭代替了金鳳打掃小屋，也取代了金鳳給予感情的角色，並會和王銀在小屋中偷情：

下到那水光嵐影的濱海小村莊去。

一走進金鳳白色小木屋，就像走進一個浪漫的夢。

窗外是一片藍色的夏日海洋，隱隱傳來陣陣濤聲，優美，安詳，寧宜。

「親愛的，就讓我們永遠住在這裡吧！」坐在化妝台前她一邊對鏡補妝一邊輕嘆的說。

「這是夢！」他回答她。

「是一個煙樣不著邊際的夢呵！」她接著深深嘆息說。（《荒島幽秘》，頁128-129）

王銀和李玉蘭的結合，很顯然比之同樣是有夫之婦的金鳳幾乎近十年情慾掙扎快上許多。王銀和李玉蘭的情慾關係，敘述者不無解釋的說李玉蘭站在參謀官妻子權勢的強者地位，奪取了王銀的愛。李玉蘭如惡狼般的醉心情慾挑逗，人格上近於王銀的敘述者說是「卑下嗜好」、「渴求貪婪的色魔」（《荒島幽秘》，頁94）；但事實上小說中李玉蘭卻如一位性愛導師，在小屋中解放了王銀。他們在越過相思樹林後在金鳳小屋性愛，「她的饑渴放浪和主動，立刻掃除他的儒怯恐懼，一次狂熱的愛的結合美滿的形成了」、「一再的，一再的，在瘋狂中，讓他滿足再滿足，在激烈的纏綿中讓他把多年情慾的饑渴，都滿足在這銷魂的一瞬」（《荒島幽秘》，頁88-89），海濱小屋成為他們固定偷情的場所，成為另一層意義的「世外桃源」。

梅濟民的小說雖然從來不避諱性愛在人生與男女愛情中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卻很少正面而深入的表現性慾對王銀的意義。王銀的形象高潔超然，長達20年的監禁，他在小說中不停自白提醒自己要保持免於瘋狂和同流合汙的強大

45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288-289。

理性。他內在情感澎湃，外在則在理性的節制中顯得平和。小說中的性慾都是跟著情感而來，跟隨著愛情結合，他強調愛而不彰顯性。梅濟民的筆下提高理性與愛的高度，且理性會戰勝情感，或是比情感更為重要。理智在情感壓抑的過程中加以彰顯，如此代表著人格高尚與知識分子的崇高性。反抗和行動力不能彰顯主體，反而是壓抑、控制自我可以，這種內在風暴的平衡，在監禁的過程中變成一種內在性的處世之道。這使得梅濟民在寫及李玉蘭情慾的解放時充滿矛盾，小說中絕口未及王銀可能對李玉蘭所有的身體渴求，而甚是「為金鳳難過，她所苦苦渴慕的境界，竟被膽大放蕩的李玉蘭搶先佔有」，在李玉蘭權勢的壟斷下，「王銀敢不滿足李玉蘭的渴慕嗎」（《荒島幽秘》，頁93），王銀在李玉蘭的情慾場中彷彿是一個無辜的人，這樣的描述保全了王銀的理性高度。

觀察王銀和李玉蘭的接近已經是王銀刑期已滿，不得釋放，再度回到綠島監獄之時。王銀雖表現平和，內心卻不可能平靜，李玉蘭在此時實是成為衝擊王銀理性界線的缺口，走進小屋如走進浪漫的夢，看來在以幽靜寧和的浪濤聲包裹著的小屋，情慾在隱密而安全的狀態下發洩，他和李玉蘭在巫山雲雨中如夢似幻，海濱小屋包容著王銀的愛欲滿足他、解放他，是以完成生命缺陷的姿態回應命運，呼應人性深層的呼喚，調整自我的價值。

人能接受既有的空間，也能對空間從事意象的再創造。《那年在特約茶室》藉由海的母性渲染出期待救贖的渴望，渡船隱喻著生命境界的提升，再自貝殼傳達騷動的情慾和對愛的渴盼，在人物和空間意象的互動過程中突出存在主體的非理性和超越現存狀態的期待，對戰爭之下的人性扼殺提出控訴。相反的，《火燒島風情系列》中的人物則強調情感的壓抑，人物用理性來抵抗非理性能判斷的冤獄，以海水洗滌受創傷的憤怒情感，舒擴胸懷。在荒蠻的海上島嶼由船隻寄託和外界接觸的情感渴求與對知識的盼望，並於小屋的日夢中安慰潛藏在理性下的情慾。即便空間是靜止的，人卻是流動的，個體在空間中累積生命經驗，從「逃避」到創造，他們改造了原來扼殺生命的空間，重寫空間對其意義和價值。

2001年梅濟民寫信給當時的副總統呂秀蓮，懇請呂副總統向綠島鄉請示允

許他死後能葬在火燒島專葬政治犯的的新生公墓：

我愛火燒島，火燒島的優美曾化解過我，二十年「白色恐怖」幽禁的心靈苦痛，我已把這詩樣畫樣的小島，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我愛那片山海，我醉心那小島上的優美風情。我能在我最喜愛的這片碧海藍天下永久安眠，連我死也成了首美極的詩篇！

懇請尊敬的 呂副總統千萬幫我完成這心願，這將成我泉下永恆的喜悅！⁴⁶

梅濟民在《火燒島風情系列》小說形容王銀的命運是「悲愴之美」，沒有人像是梅濟民一樣在無辜的忍受了20年的監禁，竟還能說那是「美」。生命經驗的美感化與精神價值的極大化，也使得空間重新被詮釋和認同。梅濟民在不可解釋、不能以邏輯判斷的災禍中，所堅持的仍是心靈上的提升，儘管是藉由個人的修為、甚至是遁入回憶與玄想來達到超越，但那又是多麼強大的精神力量。不論是自然環境、其中的物質意象、或是三女性的象徵性形象，他將自我經驗、感知、渴望美感化，使得他最終找到可安居的精神家園。

五、結語

舒暢與梅濟民作品所發表的時間為九〇年代初期，而這時期正是外省族群經驗書寫正熱烈的時刻。這不僅是在「發現台灣」也是在贖回歷史，從八〇年代末期到多元發聲的九〇年代，眾多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嶄露頭角，書寫其身分經驗，例如朱天心、苦苓、張啟疆、蘇偉貞、李渝、林耀德、袁瓊瓊、蕭颯、張大春、孫瑋芒等。相較於這些外省的第二代作家，舒暢與梅濟民屬於他們的上一代，他們的這兩部作品，在文壇上的光芒顯然黯淡許多，但是異質性也高出許多。

金門與綠島兩離島，在台灣本有其特殊的歷史處境。舒暢與梅濟民，他們以「特約茶室」和「綠島監獄」兩個異質空間來彰顯其歷史的特殊性外，也隱

46 梅濟民，〈梅濟民致呂秀蓮副總統信函〉，見吳慕潔，〈梅濟民及其作品研究〉，頁154。

喻他們自身孤絕的生命處境。當八〇至九〇年代以降的外省第二代眷村書寫，重新思考或是質疑以忠黨愛國為號召的價值框架，舒暢與梅濟民早已用他們的身體感受到更深刻的殘酷背叛。《那年在特約茶室》寫出1949年遷台外省人與親人隔絕的離散命運，進退兩難的軍人身分，老兵們面臨孤寂虛空，乃至於瘋狂崩潰的精神狀態；《火燒島風情系列》寫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孤絕悲哀，政治犯無辜入獄，內外煎熬的精神壓迫，刑滿不得出獄的荒謬處境。他們都受到威權政體的隱瞞與擠壓，但是和它的關係又難捨難分。未來的輪廓混沌難明，他們同樣透過文學的創造，重新思考了自我與生命的意義。

人類根據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環境，並賦予其意義。金門成為反共復國的堡壘、綠島成為監禁犯人的惡魔島，都是其寫照。我們從這兩個島嶼，看到國家機器和意識型態的相互結合，使得它們有了相對於台灣本島的符號性指涉。但是，創作者飽含情感的主體面對無法主動加以扭轉的場域，也有其主觀感性和思想。舒暢與梅濟民用語言的力量扭轉或是抗議原來扁平的符號意義，並深度的挖掘出自身的存在課題。正如巴舍拉所提示，「想像的自然實現著原生的自然，和所生的自然的統一。當詩人經歷了自己的夢和自己的詩歌創作，他就實現了這種自然的統一」。⁴⁷ 筆者分析這兩部中以水為核心的意象群，自水的原始物質意象的呼喚中，闡釋了他們對於自由、慾望、知識、生命的渴望，並且突出了作者那些無法忘懷的，溫暖的愛。

舒暢和梅濟民正是由創造中統一了來自水本身的原始特質以及他們不得不身處環水島嶼的無奈處境，面對嚴厲的身體禁錮，小說中的人物同樣展現生存的意志，以空間為基礎，自身體與心靈的辯證中尋找出口。他們以己身的真實經驗為藍本寫作小說，同時也改寫了國家機器將空間符號化的詮釋方式，那是來自於水的呼喚，也是呼應自然的呼喚，通過想像主體與意象的同構，在意象世界中暫時的平息了人世間的不幸。

47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50。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宋怡明，《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8）。
-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台北：國際翻譯社，2009.02）。
- 陳玉峯，《綠島解說文本》（台北：前衛出版社，2015.11）。
- 陳長慶，《金門特約茶室》（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12）。
- 胡建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31輯（台北：國史館，2007）。
-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07）。
- 張振騰、張翠梧著，《綠島集中營》（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07）。
- 梅濟民，《北大荒》（台北：旗品文化出版社，2004.08）。
- ，《荒島血淚》（台北：當代文學研究社，1993.06）。
- ，《荒島玫瑰》（台北：當代文學研究社，1993.06）。
- ，《荒島幽秘》（台北：當代文學研究社，1993.06）。
- ，《荒島流雲》（台北：當代文學研究社，1993.06）。
- 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02）。
- 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台北：九歌出版社，1991.09）。
- ，《院中故事》（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5）。
- ，《焚詩祭路》（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05）。
- ，《舒暢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05）。
- 楊照，《文學的原象》（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01）。
- 趙彥寧等，《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07）。
- Gaston Bachelard（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2003.07）。
- （加斯東·巴什拉）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中國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01）。
- Yi-Fu Tuan（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6.04）。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林傳凱，〈「白色文學」上——梅濟民、火燒島，與他的《北大荒》〉，《人本教育札記》312期（2015.06），頁92-96。

張玲，〈這一代的鄉愁——訪梅濟民先生〉，《幼獅文藝》296期（1978.08），頁169-180。

（二）學位論文

吳慕潔，〈梅濟民及其作品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徐薇雅，〈舒暢及其小說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三）研討會論文

侯如綺，〈司馬中原《最後的反攻》中「性」的書寫探析〉，「2012女性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2012.03）。

